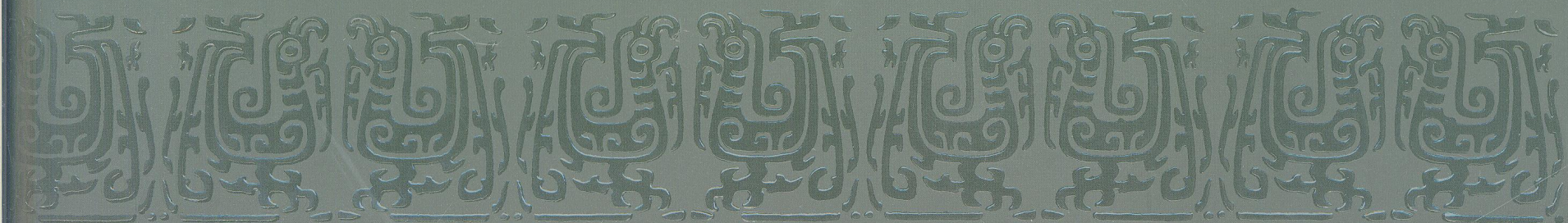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青
铜
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国家文物局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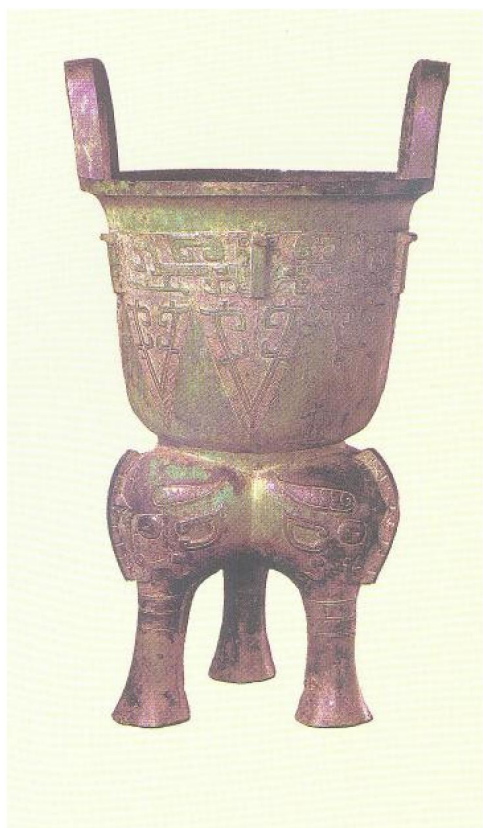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青铜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联合出版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

国家文物局主编

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鲗鱼涌芬尼街 2 号 D 侨英大厦

制版：亚洲制版有限公司

香港柴湾丰业街 10 号业昌中心 7 字楼 A 座

印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18051

发行：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开本：1180×1060 1/16

印张：26.75 插页：4

版次：199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9001—10100

书号：ISBN7-5326-0376-8/J·12

定价：384 元

(发行于中国大陆)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青
銅
卷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主 编 单 位：国家文物局

主 编：彭 卿 云

副 主 编：刘 炜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承源	王芝芬	王志敏
王克荣	王勤台	王翰章
尤翰青	甲 央	叶佩兰
史树青	白云哲	吕济民
朱世力	庄 敏	刘 谷
刘 炜	刘九庵	孙传贤
苏 俊	杨子荣	杨仁恺
杨关林	李复华	吴正光
邱宣充	沙比提	沈 竹
宋伯胤	宋良璧	初世宾
张春生	陈仲明	陈全方
陈孟东	罗哲文	周其忠
侯菊坤	姚立信	姚苑真
耿宝昌	殷德明	高 和
郭文奎	梅福根	彭适凡
彭卿云	谢辰生	谭维泗
熊传新		

责 任 编 辑：杨关林 王芝芬 谈宗英
陈光裕 王圣良 李翠莲

装 帧 设 计：江宝灵 王鉴丰 陈月娴
廖丽珊 郑家亮 江小铎

封 面 题 字：顾廷龙



青铜卷

分卷主编：马承源

分卷副主编：刘炜 熊传新

主要撰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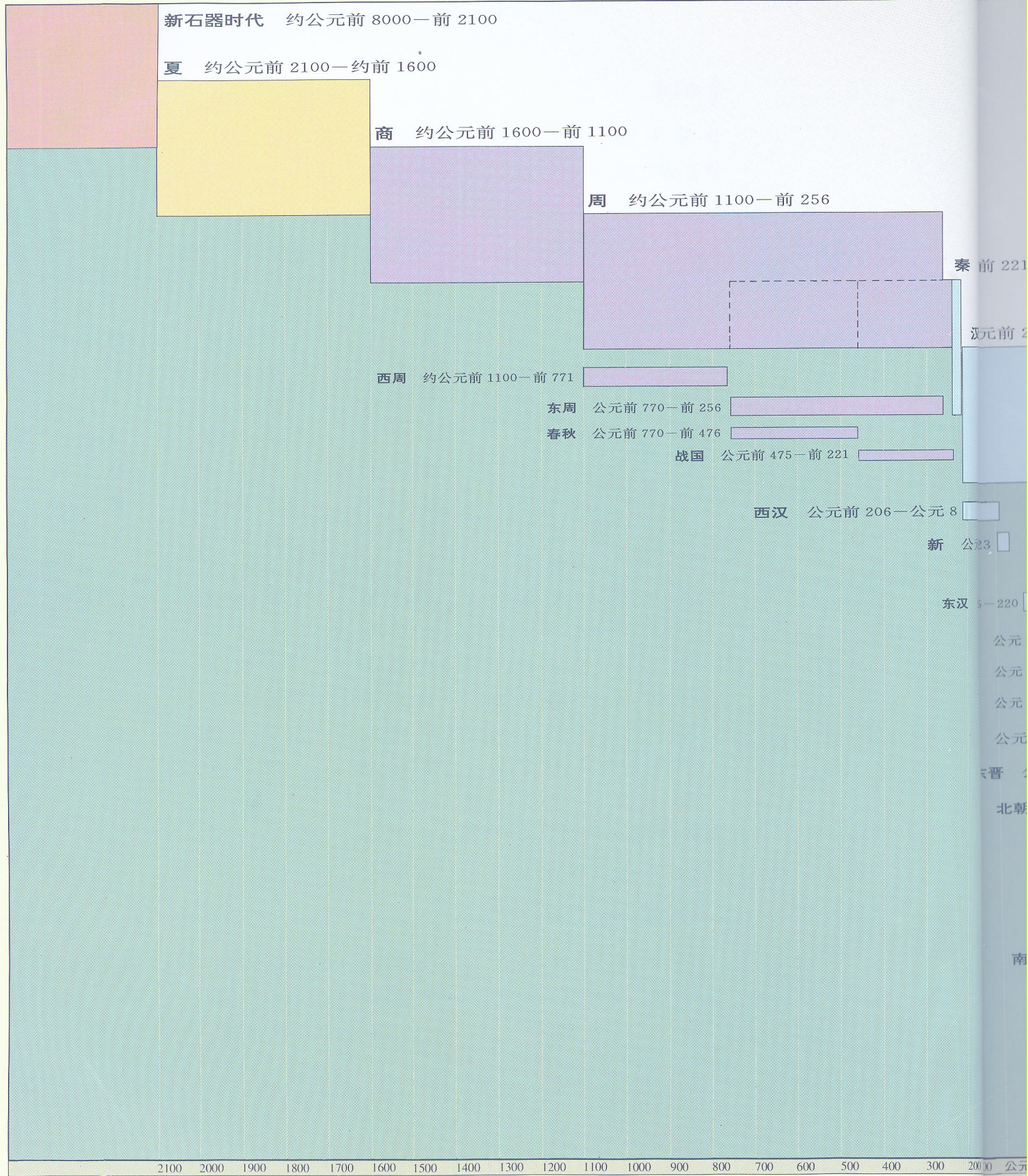
万树瀛	马世之	马秀宽	马秀银
王海文	王慈民	王翰章	牛子儒
石志廉	白云哲	成恩元	任常中
刘炜	刘龙启	刘来成	刘秀中
刘彬徽	刘豫川	牟永抗	贡昌
杨仁恺	杨桂荣	李莲	李东琬
李国梁	李俊德	吴诗池	吴铭生
邱宣充	余家栋	张平	张东辉
张吟午	陈小华	陈贤一	陈佩芬
陈孟东	陈献增	易学钟	罗家容
周其忠	项春松	胡振东	胡振祺
胡悦谦	院文清	姚苑真	秦明智
贾效礼	徐秉琨	徐恒彬	徐鹏章
翁善珍	高至喜	高次若	郭素新
郭德维	黄正中	萧梦龙	曹者社
韩集寿	蒲朝绂	詹开逊	雒忠如
谭今章	谭用忠	熊传新	黎小明

主要摄影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永革	马晓旋	王露	王书德
孔群	刘士刚	孙克让	杨国庆
李国强	李恒贤	张羽	张慧
陈美如	罗忠民	郑铭祯	赵洪山
郝勤建	胡锤	胡悦谦	郭群
郭林福	阎新法	潘炳元	魏桂宁



中国历史年代表



公元前 221—前 206

汉 公元前 206—公元 220

三国 公元 220—280

晋 公元 265—420

南北朝 公元 420—589

隋 公元 581—618

唐 公元 618—907

五代 公元 907—960

宋 公元 960—1279

元 公元 1279—1368

明 公元 1368—1644

清 公元 1644—1911

元 前 23

公元 25—220

魏 公元 220—265

蜀 公元 221—263

吴 公元 222—280

西晋 公元 265—316

东晋 公元 317—420

北朝 公元 386—581

北魏 公元 386—534

东魏 公元 534—550

西魏 公元 535—557

北齐 公元 550—577

北周 公元 557—581

南朝 公元 420—589

宋 公元 420—479

齐 公元 479—502

梁 公元 502—557

陈 公元 557—589

五代

后梁 公元 907—923

后唐 公元 923—936

后晋 公元 936—946

后汉 公元 947—950

后周 公元 951—960

北宋 公元 960—1127

南宋 公元 1127—1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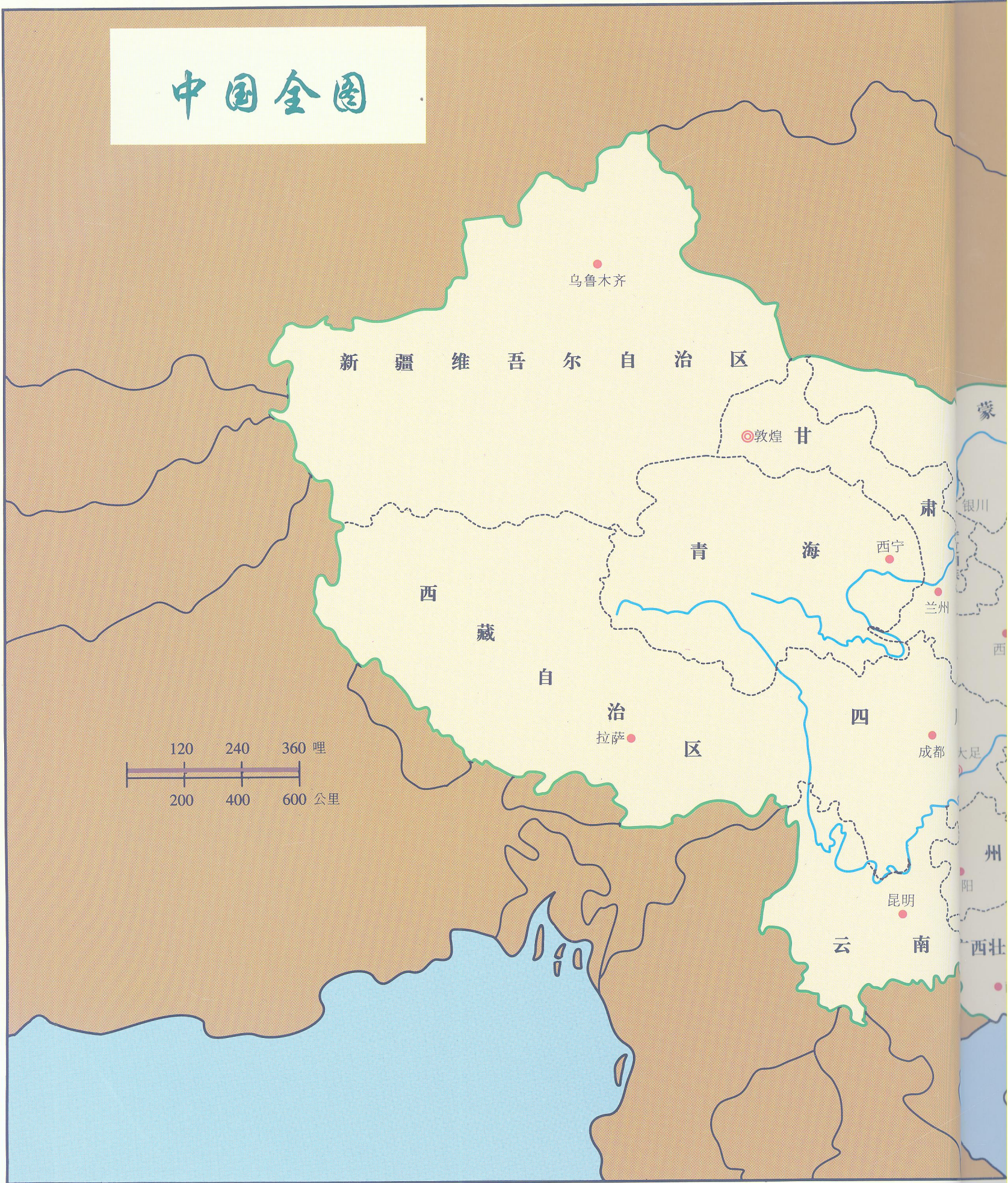
辽 公元 916—1125

西夏 公元 1038—1227

金 公元 1115—1234

0 100 公元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中国全图





总序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是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工具书。它的编写工作,始于1982年冬天。那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同国家文物局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名胜词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的工作中,发现文物辞书的巨大潜力,又提出了编写馆藏文物辞典的构想。国家文物局出于对历史文化研究和弘扬的需要,同意作为文物系列辞书工程之一,承担编写任务。翌年即行组织、部署,付诸实行。此后,各项编审工作几经周折,历尽艰难,直至今天,才有幸同读者见面。十年磨一剑,一旦试锋芒,喜悦、欣慰之情,自不待言。

文物辞书的兴起,是文物普及、开放的一项创举,也是图书出版园地的一树新花。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第一部文物辞典的出现,曾一度风靡海内外,几成纸贵洛城之势。从此,各类文物辞书纷纷面世,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各界的读者,成为传播文物知识,弘扬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但是,更多的读者渴望能有一部更具规模和权威的馆藏文物辞典,发挥多种功能,满足各界的需求。在这种呼声的鼓舞下,《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编撰工作终于开始,大家都对此书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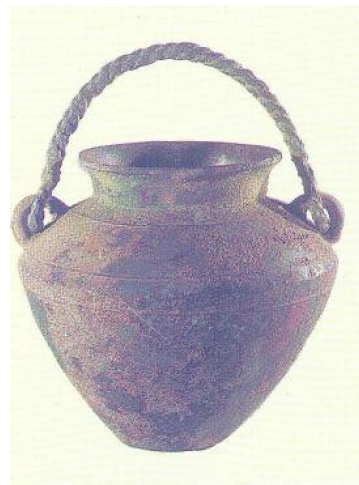
此书编辑工作,除了天时之顺,还享有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中国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保存在地面的文物史迹达数十万处之多,收藏在各地博物馆内的藏品共计千余万件,其中被视为国宝的一级品共十余万件。本书共收录文物五千余件,均选自一级品,近乎百里挑一,其基础之优厚,入选品之精湛,皆可想而知。特别是这五千余件文物,纵贯全部中国历史,横跨整个中国国土,各个朝代、各个省市、各个民族、各个品类,应有尽有。既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又考虑地区、时代、民族的平衡,使之环环相扣,形成有机的整体,充分体现中国文物博大精深,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特点,反映中国文明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史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华古国辉煌历史的缩影。玉出蓝田,得天独厚。多姿多彩的中华文物,为此书提供了赖以立足生根的沃土良田。为此,编者、出版者十载耕耘,坚持不懈,决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内涵,把国内外读者引入古老的中华艺术之宫,让他们享受到永恒的

美。

这样一部堪称鸿篇巨制之作，人和之利乃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国家文物局作为主编单位，为此投入人力之众，财力之多，累计起来十分可观。全国各地参与组织、协调、撰稿、摄影、审议等各项基础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均数以百计，洋洋乎大哉。在编审过程中，研讨工作之反复，与各地编写人员交往磋商之频繁，更不可胜计。为编写图书如此兴师动众，在文物界确是十分罕见的了。大家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同心同德，共赴艰难，无私奉献。尤其是分别担任陶瓷、青铜、金银玉石、书画四大类分类主编的耿宝昌、马承源、史树青、刘九庵四位著名专家，从年富力强编到两鬓生霜，自始至终，尽心尽力，坚持承担把关、定稿、作序的任务，其事业心、责任感、治学精神，均可钦可佩。在他们分别所作的分卷序中，全面介绍了各卷的文物情况，并且从文物的产生、衍变，阐释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从人们对文物的探索、认识，概括了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从文物的形态、特征，揭示了制作者的思维、创造的能力；从对器物艺术性的分析，激起读者对美的追求。此外，白云哲、叶佩兰、刘炜、周其忠、王志敏等专家分别承担各卷的主要编审任务，为之付出了大量心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这部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文物工具书，是包括许多无名氏在内的全体参与者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是许多专家、学者智慧和专长的结晶。它在各地发掘、收藏、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主导作用，力求学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确保其权威性。

中国文物的丰富多彩，不单体现在数量之富，更重要的还是品类之全。历代先民生息、劳动所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留下大量可供见证的实物。本书收入的五千余件精品，如按其用途分类，则百科具备，反映了古代人类生活的全貌。出于编辑、实用的需要，全书只能按器物质地共分成四大类（卷）。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艺术鉴赏机会，顺应世界出版业的新潮，全书一律采用实物原拍照片，其中彩图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美中不足的是台湾藏品因至今未能取得适当照片，只好暂付阙如。香港商务印书馆为了保证质量，不惜心力，采取最新技术出版精装本，向世界各国发行。编辑辞书，虽是雕虫小技，但真正适合众人的好辞书，又谈何容易。特别是文物辞书，非有图文对照不可。对于文物的鉴赏和研究，通常只能按图索骥，才有所获。因此，为了取得所需的合格照片，许多工作人员奔波劳碌，付出了大量心血。由于编辑工作的旷日持久，各地不断出土新的文物精品，又给辞书的收词时限带来了新的问题，最后经专家讨论，





决定以 1988 年为终限。但是,鉴于此后又有考古新发现,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商代墓的铜器等,曾经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所以仍然未能忍心割爱,收录了其中若干精华之最,从而尽可能使本“大辞典”名实相副。

中国现有的馆藏文物,是中国文物宝库中最可宝贵的组成部分,它所蕴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当今百废俱兴的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如何保护、利用好这笔财富,是当代每个中国人应该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这里必须防止把文物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全盘否定文物的价值,搞民族虚无主义,拒绝古为今用;一是国粹至上,封闭自守,夜郎自大,排斥洋为中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量有益于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文化精华,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许多能够发挥科研、教育、借鉴、审美等多种作用的文物,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研究和展示工作仍是一大薄弱环节。特别是文物图书出版对于文物保护、开放的重要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估计,以致迄今没有一套能够概括中国藏品概貌的大型图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增大。这一状况,与泱泱文物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也与改革开放的要求不相适应,早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文物作为人类的文化遗存,既为本民族所共有,又为全人类所共享,其本身就具有开放的性质。任何珍贵的文物,只有通过保护、研究,向全社会开放,让公众领略其价值,才能有机会发挥其作用。如任其永久韞椟而藏,秘不示人,就如同废物,无任何价值、作用可言。文物又作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同现代化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现代化具有特殊的作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许多国家越是全面开放和发展经济,就越发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开放工作。文物保护、开放的成绩,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日本在开放过程中对国外的科技文化大量吸收,其现代化的速度遥遥领先于世界;与此同时,他们对本国历史文化遗产又倍加爱护,并且通过陈列、出版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开放展示,其成绩也位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开放和现代化被视为世界之最,它把五十年以上的有历史、纪念价值的建筑等都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千方百计地收藏世界各国的文物、艺术品。法、英、德等许多欧洲国家也莫不如此。它们的文物保护、开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予以加强,各自固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随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突出。为什么这些国家如此重视文物的保护、开放,而且能够融传统与现代化于一体呢?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是并不神秘,归根结底,是开放与现代化本身的需要。文物通过开放、

展示,不仅满足人们对文物不断增长的爱好、兴趣,更重要的是赖以增强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维系民族团结,激发国人的献身精神。因此,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文物保护、开放的经验,探讨传统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正确处理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特殊关系,对进一步搞好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最大限度地强化全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令人鼓舞的是,正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文物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在抓住机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能高瞻远瞩,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改革开放的特殊需要出发,果断地确定了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总方针,并且拨出巨额专款落实抢救任务,把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推向新阶段。此时此际,《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得以问世,确是风云际会,值得庆幸。如果它能够在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工作中起到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如果它能够在中国文物图书攀登世界高峰之路上迈进新的一步,这将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补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并没有自负、自夸的意思。但是,确也自信好的文物图书,能够较好地再现文物的内涵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同文物本身一样,能够跨越时空界限,跨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人以永恒的智、德、美的感染和启迪。这样的图书一定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当然,它也同其他图书一样,优劣高下,不能光凭编者分说,而只能由读者评论,实践检验。《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由于规模巨大,内容繁博,差错疏漏必不可免。对此,竭诚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以求“大辞典”更为完美。

彭卿云

1992年初秋于北京



序

二里头文化期

一般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始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这时在中原地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期，在黄河上游是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前期据碳-14 测定的数据是公元前 1920 年±115 年和前 1900 年±130 年。齐家文化据碳-14 测定的数据是前 2255 年±140 年，另一个较晚的数据是前 2034 年±81 年。齐家文化的发现是红铜器和青铜器并用，器物大都是工具，没有发现容器。青铜镜是当时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尤其是七角星纹镜，是前期青铜镜上装饰纹样出现的首例。齐家文化的特殊之处是青铜镜的铸造和使用要先于中原商文化 600—700 年。

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已经做得很多，考古界的争论还很大，它是夏文化还是前商文化，或者前期是夏文化，后期是前商文化的问题，至今仍在讨论之中。业已发现的二里头二期文化和三期文化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一致性。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形式、纹饰和风格，与商代前期二里冈型的青铜器相比较，其异同之点是很显然的，从整体而言，其相异之处大于相似之处，两者还不可能在一条线上径直连接起来。我们在这里将之与确切的商代铜器分隔开来，仍冠以这一考古文化的名称。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突出成就是青铜容器的出现，业已发现的器物有爵、角和斝三类。这些器物都是酒器，形制复杂，从铸造角度来看，因为需要作内、外范的多次分型，比之单范或简单的复合范铸造器物在技术上是一次飞跃。二里头青铜铸造业解决了铸造容器的陶质块范的合型，促进了日后青铜生产的发展。二里头青铜器的造型已有相对固定的格式。目前发现数量较多的爵，其基本造型都是相似的。其中一部分爵的式样和陶爵相当接近，另一部分已从较原始的式样中分离出来，成为有独立特征的青铜爵。还有一小部分则大有改进，已经注意设计的形态之美了。这可能是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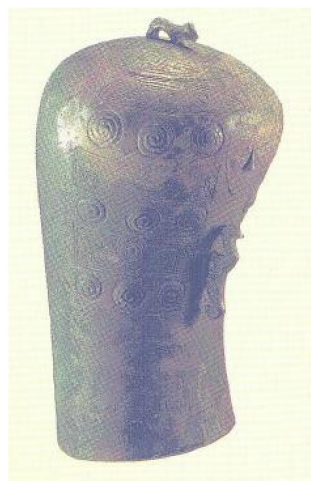
映了青铜爵发展的器形序列,也可能是体现形式设计的高下之分。二里头青铜罍也是如此,一部分具有某些陶器特征的外形,一部分形体较为规整,有个别的器则有较为优美的外形了。由于二里头的青铜器已与镶嵌工艺相结合,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饰牌已发现好几面,传世的一些同样的饰牌,也终于被认定为二里头文化的产物。由此可以知道,二里头较高设计水平的青铜器表明它已经不是初始阶段的产品,人们有理由期望,当有更早阶段青铜容器的铸造存在,它的发现,也许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商 代

商代积年有多种说法,汲冢书纪年载为 496 年,也有 600 余年的记载。现今史学家认为,公元前 16 世纪是商汤立国的开始,前 11 世纪周武王克商。在习惯上,将盘庚迁殷作为商代前后期的分界,这可能不能作为商代文化发展的界线标志。在盘庚迁殷以前,现今发现的商文化,主要是郑州二里冈期的文化,因此这一文化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称为商代前期青铜器。郑州商城遗址据碳-14 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 1620 年左右,据此,二里冈期商代的青铜器是公元前 16 世纪到盘庚迁殷以前之间某一阶段的产物,即它只能反映这约 230 年内较前时期的青铜器。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不一样,它是盘庚五迁以前的一个都城,而殷墟作为商的首都有 273 年的时间。我们以往说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是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并不意味着它是整个商代前期青铜器的整体面貌。近几年,郑州发现了少量比典型的白家庄式青铜器较晚的器物,看来郑州商代前期青铜器的出土,还在不断充实人们的认识。同时,还应进一步指出,二里冈期商代青铜器和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虽然某些器类相同,但是在形制、纹饰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从整体而言,二里冈期青铜器是相当成熟的,它已能铸造 1 米高的大型容器,并且形成了丰富的艺术装饰,而艺术装饰是非常有个性的一种文化现象。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与之相比有颇大的距离。因此郑州二里冈期的青铜器,其溯源尚不清楚。

二里冈期的青铜器,除了郑州以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也有一整批器物的





发现。盘龙城商代前期青铜器的器类，有一些是郑州所没有的，如提梁壶、管流爵、生产工具及兵器等。但是盘龙城商代前期墓葬中的青铜器有一些在造型、纹饰、器物厚度等方面都比郑州二里冈商代前期青铜器要晚，制作更为精工。

晚于二里冈期，早于殷墟前期的青铜器典型，有安徽阜南发现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安徽嘉山泊岗出土饰有兽面纹的爵、斝、觚、鬯等器；陕西城固出土的三足兽面纹提梁壶、提梁扁壶、兽面纹鬯、一柱爵、兽面纹四足鬯，以及斜条乳钉雷纹簋；殷墟墓葬出土的有关青铜器；以及散见于海内外各博物馆的若干藏品。这些器物上接二里冈型青铜器，下接殷墟前期，大约不会晚于商朝小辛小乙。如果把河北藁城台西的全部青铜器划入商代前期，则这阶段的下限可能要下接武丁的前期，武丁的前期可能是一个交叉的时期。因此，目前称之为前期的商代青铜器，有可能重新进行分期。

商代前期青铜器的组合体制是以酒器为主，有爵、觚、斝、尊、鬯、甗、提梁壶、提梁扁壶、提梁三足壶、盃等器物。爵、觚是一组基本酒器，稍微扩大一点的是爵、觚、斝，其他按使用者的地位和需要而置。如此辉煌的酒器体制的建立，决定了商代整个青铜礼器发展的基调。商代前期青铜食器有鼎、方鼎、鬯、甗、簋等，数量虽少，而器类俱全，水器盘也已出现。青铜农具、工具都有所发现，青铜兵器的种类大都俱全。从铸造方面而言，除了普遍用陶质块范浇铸器物，还使用了分铸法来解决复杂的器物造型和器上的活络部件。以后商代的器物铸造，都是在这一技术基础上进行的，所不同的只是工艺水平更加精湛而已。可以说，商代前期业已建立起极其可观的青铜铸造业，这是商代前期青铜文化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和二里头文化极为朴质的青铜器相反，商代前期的青铜器普遍装饰有线条粗犷有力而构图茂密的纹样。主题纹饰采用左右展开的抽象动物纹，最复杂的纹饰除主纹外还有抽象的鸟纹作为附饰，有的附饰在两侧的鸟纹之上更有一倒置的小兽。这样的构图特点贯彻了商代全部的兽面纹。兽面的凝视点是双目，可以看到双目的位置愈来愈突出，非常注意图案庄严威慑特征的表现，这种风格在往后的青铜器中更为突出。